

“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政治”笔谈

编者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于 2016 年 3 月 8 日举办了“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政治”学术研讨会,在此选登的是部分与会学者的发言。郇庆治以我国绿色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中所发生的从可持续发展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转换为例,探讨了作为环境政治主体之一的学术群体的角色,强调我国的相关性研究机构、学术社团、民间智库和学者个体应该对这种转换有一种反思性立场,并批判性思考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贝特霍尔德·库恩讨论了以联合国为核心达成的从《千年发展目标》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可持续发展话语(政策)的演进,阐述了中国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过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以及中国未来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会遇到哪些不同层面上的挑战。李全喜通过比较分析“可持续发展”与“发展替代”这两种颇为不同的伞形范式性话语,认为它们各自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理论言说与认知语境,并且可以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尤其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讨论提供有益启迪。杨志华认为北京林业大学的“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CI)”及其年度评估报告是对我国各省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较为全面科学的评估,尽管在具体的指标设置、数据获得和评估结果应用等方面还存在着进一步改进的空间。王聪聪着重分析了欧洲左翼党生态政治理念与政策观的绿化进程,认为它无论在生态危机的经济社会根源认知还是在生态危机的全球视野应对方面都有着明显的“红绿”特征,从而构成了欧洲“泛绿”政治文化(即可持续发展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

环境政治学视野下的绿色话语研究

郇庆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绿色话语”,也可以说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或生态文化理论,既是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生态环境问题或挑战应对实践的客观性反映,也是人文社科机构与学者所进行的理论构建活动的主观性结果。依此而言,无论是可持续发展还是生态文明建设都可以理解为一种“绿色话语”或理论,而对绿色话语或理论的研究本身就是现实环境政治与社会实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行为体。

从全球层面看,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战略之所以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成为一种主导性绿色话语并非偶然,直到如今,它的全球性共识或引领地位仍是无可置疑的。联合国 2015 年通过的内容更为丰富的 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取代 2000 年接受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就是明证。但就中国而言,从一种回顾的视角来看,虽然我们在贯彻落实 1992 年达成的联合国《里约宣言》和《21 世纪议程》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比如 1994 年通过实施的《中国 21 世纪议程》,以及此后广泛开展的“清洁生产机制”(CDM)方面的国际合作,并逐渐扩展为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领域的

探索,但总的来说,至少自2007年以后(经过此前的科学发展观讨论的过渡),生态文明建设逐渐成为我国主导性的绿色政治共识或理论话语。到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核心性理念与战略。简言之,差不多20年间,我国的主导性绿色话语明显发生了从“可持续发展”向“生态文明建设”的转换,尽管不能说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替代”(事实上,可持续发展逐渐演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下“三个发展”中的“绿色发展”,而后者又成为国家“十三五”规划特别强调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

问题不在于“可持续发展”话语和“生态文明建设”话语本身的对错或优劣,因为,任何全球性话语的中国化都是其真正走向或影响实践的必要步骤,可持续发展也不例外。笔者所感兴趣的是,我们需要充分关注上述话语转换发生的深层原因和路径机制。笔者认为,我国的相关性研究机构、学术社团、民间智库和学者个体应该对这种转换有一种反思性立场,并批判性思考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一般而言,环境学术机构和学者作为绿色话语研究主体,至少承担着如下三个方面的职能:一是构建理论话语,也就是从事学术基础性的研究。二是组织学术批评,也就是促成一种基于学术准则与规范的话语讨论或辩论。三是倡导与推动话语走向实践,尤其是政策化制定与落实。上述三个方面对于某一个机构和学者来说也许会有所偏重,但对于环境学术机构和学者总体来说却必须是一个不可偏废的有机整体。过分地专注于概念学理层面上的纵横捭阖,或者过分地关注于政策及其技术操作层面上的进退利弊,对于任何一个绿色话语及其研究来说,都算不上一种优良的生态。

这样一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批判性反思过去20多年中的可持续发展话语研究和近年来的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研究。就前者而言,国内外都有许多学者批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战略的贯彻落实不尽人意,这其中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但就我国学术界的自身情况来说,必须承认,上述三个层面上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在话语构建层面上,除了难以克服的汉语语法习惯上对于形容词“可持续”意涵的不易把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生态、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未做出令人信服的创新性阐释,也就谈不上对这种话语架构本身及其背后隐藏的西方国家主导逻辑提出任何意义上的实质性挑战;在学术批评层面上,部分受制于我国整体性的学术生态,我们既缺乏围绕基本概念、理论观点的学理性论辩,也缺乏对公共政策倡议及其理论基础的严谨批评,这种发育不完善或扭曲性学术生态的直接受损者是学术界自身——我们很难从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创新理论、发展理论;在走向或影响实践的层面上,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政策、实践的脱节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失去了实践滋养的所谓理论只能是“灰色”的,而失去了必要理论支撑的政策或实践只能是支离破碎的或无序的,结果是,看起来形式多样的可持续发展项目(行动)其实未必具有“可持续性”的灵魂。总之,当我国经过近40年的所谓“经济腾飞”时代却不得不面对一个社会与生态可持续性严重下降的现实时,必须承认,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话语及其研究远未产生许多人想象得那样的积极成效。

就后者而言,从可持续发展话语到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的重点转换,应该说已经发生了令人欣喜的重大进步,尤其是,由于时局变化与党和政府的强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的实践影响力与融入路径大大强化了。但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研究在上述三个层面上仍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诸多问题。在话语构建层面上,除了不易消除的“生态文明”这一中国语词进行国际传播时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无论作为一个伞形术语还是作为一个环境人文社科理论流派的系统性阐释,仍是远远不够的;在学术批评层面上,迄今为止的大量学术著述仍过分集中于对党和国家政策文献的理论诠释,而不是着眼于各自学科视野下的学理性讨论,看似彰显着普遍性理论共识的外表其实并不能为生态文明的政策细化与实践推进提供有力支撑;在走向或影响实践的层面上,理论话语与政策与实践之间的互动,客观地说,依然没有呈现为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关系,因而看似来自公共政策圈的“蛮横”背后所凸显的是理论界已落后于实践和政策倡议供给能力严重不足的现实。总之,笔者无意否认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研究地位得以提升的合理性,以及近年来学术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而是想强调,我们必须保持一种审慎或反思性的立场。换言之,必须不断地追问: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研究是否以及何以能够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的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公正,即实现国际可比较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一种更高水准的绿色话语研究,可以使包括高校和民间智库等在内的学术研究机构与学者个体成为一个更为积极的环境政治主体,从而更有效地推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一个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理解哲学价值伦理取向或意识形态与绿色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些“政策变现”能力不强的那些激进版本的绿色话语?比如,可持续发展话语的讨论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之分,而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中心(FFU)最先提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就大致属于一种“弱可持续发展理论”;类似地,北京大学最近组建的“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就是希望在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话语研究及其实践中引入一个“红绿”或“绿色左翼”的政治维度。本人对此的阐释主要是受到英国学者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的启发。^①他在论证激进的生态主义的研究与宣传的作用时指出,激进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哲学的首要作用,是为现代民主社会确立一种政治思考与选择的最大空间或极限参照。也就是说,现代民主社会在现实中恐怕都不会严格实现任何一个最为激进的政治想象,但如果没有这些激进的政治想象的话,现实政治将会是缺乏任何方向的。大致在上述意义上,笔者认为,就像“强可持续发展”话语的研究与传播具有其内在的必要性一样,“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的进一步探讨可以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独特的贡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中的中国角色与挑战

贝特霍尔德·库恩

(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奥托苏尔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国际合作政策顾问)

在2015年9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世界各国领导人接受了面向2030年的包含17个具体任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着力于消除贫穷、与不平等和非正义作斗争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些目标是在“同一个世界”的精神下达成的,涵盖了与各个国家相关联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追求。与“千年发展目标”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活动不仅关涉发展中国家的进步,而且需要所有国家做出相应的调整。

可持续发展概念涵盖并与当今中国等许多国家已在使用的其它概念术语相互交叉,比如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生态马克思主义、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学术研究与争论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各种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政策话语。目前,许多国家高校已启动了多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与项目来推进对此的跨学科理解,比如由加拿大、中国、德国、以色列和俄罗斯的五所大学组织的“可持续大学联盟”(UAS)项目。

过去几十年中,致力于环境与气候保护议题的组织、机构和研究项目成倍增长。新的智库、基金会和其它非政府组织不断涌现。社会传媒则推进了绿色知识的交流与传播。从政治学的视角看,面向绿色议题的机构与专家的大量增加,为参与性和合作性的新治理形式提供了机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合作治理在中国的出现,是政府适应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变化与挑战的新方式”。^②

中国在推进2030年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包括在2015年12月巴黎峰会前后的各种外交努力。尽管一些国家多年来指责美国和中国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缺乏诚意,但正是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在2014年11月奥巴马访华时联合宣布了各自国家对于削减其碳足迹的政治承诺。中国已经表明了,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很大程度上的灵活性,并决心消除其“国际谈判中

^① 参见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Yijia Jing, 'Introduction', in Yijia Jing (ed.): *The Road to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2005, pp. 1–22.